

中国佛教思想史

郭朋 著

(中 卷)

本书论述了佛教自西汉之际传入中国，历经隋唐，直至明清，在漫长的历程中，佛教在完成其自身的发展、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交涉，作为外来的宗教，终于形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。在思想领域，佛教与儒、道两家既相互矛盾、斗争，又相互吸收、融合，自然产生了“三教一家”、“三教同源”的思想，这种“三教一家”思想的出现，乃是历史的要求，时代的需要。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中国佛教思想史

郭朋 著

(中 卷)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中卷目录

上编 隋代佛教思想

第一章 隋王朝与佛教	3
第一节 概述	3
第二节 隋文帝与佛教	8
一 生养在尼姑庙的隋文帝	8
二 隋文帝对佛教的扶持和利用	12
第三节 隋炀帝与佛教	21
一 “不可以君天下”的隋炀帝	21
二 炀帝与“菩萨”——兼论佛教的大乘与小乘	21
三 杨广与智顗	28
四 隋炀帝的佞佛种种	29
五 隋末农民大起义，埋葬了隋王朝，也打击了佛教势力	31
第二章 隋代的佛教思想	36
第一节 概述	36
第二节 为统一的隋王朝服务的天台宗	52
一 天台宗的师承	52
二 天台宗的主要经典——《法华经》	73
三 天台宗的基本思想	81
四 天台宗的“判教”	97
五 值得一提的两部书——《国清百录》与《佛祖统纪》	101
第三节 三论宗	103
一 三论宗的创立者——吉藏	103
二 三论宗的基本思想	107
第四节 一度出现的三阶教	121
一 三阶教的创立者——信行及其著作	121

2 中国佛教思想史（中卷）

二 三阶教的思想主张	130
三 三阶教的社会意义	142

下编 唐代佛教思想

第三章 唐王朝与佛教	151
第一节 概述	151
第二节 武德时的傅奕反佛与唐高祖的《沙汰僧道诏》	154
一 傅奕的反佛	154
二 唐高祖的《沙汰僧道诏》	156
第三节 唐太宗与佛教	158
一 夺取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唐太宗	158
二 唐太宗对佛教的扶持和利用	160
三 战地建寺	163
四 唐太宗与玄奘	165
五 佛、道先后问题	168
第四节 武则天与佛教	174
一 建立了武周政权的武则天	174
二 武则天对佛教的利用	177
三 武则天与薛怀义	187
第五节 唐玄宗与佛教	189
一 “中兴”而又致祸的唐玄宗	189
二 唐玄宗对佛教的利用	193
第六节 唐宪宗迎佛骨与韩愈谏迎佛骨	201
一 宪宗迎佛骨	201
二 韩愈谏迎佛骨——兼论韩愈	201
第七节 唐武宗的灭佛	215
一 武宗灭佛的原因	215
二 灭佛的结果	216
第八节 唐末农民大起义，摧毁了唐王朝， 也削弱了佛教	218

第四章 唐代的佛教思想	223
第一节 概述	223
第二节 唯识宗	238
一 唯识宗的师承	238
二 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——玄奘	240
三 唯识宗继成者——窥基	245
四 唯识宗的主要典籍	247
五 唯识宗的基本思想	248
第三节 适应武周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华严宗	285
一 法顺与智俨	285
二 华严宗的创始人——法藏	287
三 澄观与宗密	292
四 华严宗的主要典籍——《华严经》	295
五 华严宗的基本思想	298
第四节 中国佛教的特产——禅宗	325
一 传统佛教的禅学	325
二 禅宗的产生	327
三 禅宗与“机锋”	374
四 关于神会	377
第五节 密宗	405
一 “开元之治”与密宗	405
二 密宗的主要人物——“开元三大士”	406
三 密宗的主要经典——《大日经》	412
四 密宗——“佛梵合一”的产物	417
五 密宗——佛教世界观的“杂家”	427
第六节 净土宗	430
一 净土宗的奠基人——道绰与善导	430
二 净土宗的主要经典——所谓《净土三经》	433
三 “净土”思想的阶级实质	438
第七节 律宗	441
一 律、律学与律宗	441
二 关于道宣	448

上编 隋代佛教思想

第一章 隋王朝与佛教

第一节 概述

隋王朝，是一个结束了西晋末以来近三百年分裂局面的统一的王朝。这个统一的王朝，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：

一、取周。杨坚父子，两代仕周。杨坚的父亲杨忠，帮助宇文泰建立北周政权，受封为十二大将军之一，赐姓普六茹氏，官至柱国、大司空，晋爵随国公。杨坚承袭他父亲的封爵，官至大司马、大后丞、大前疑等。而且，杨坚的妻子独孤氏，和周明帝宇文毓的独孤皇后是亲姐妹；杨坚的女儿又是周宣帝宇文赟的四皇后之一。杨坚可说是位尊而权重。周宣帝早死（死时二十二岁），嗣子幼小（宇文衍时方八岁，嗣位为周静帝），杨坚以国丈、大臣的身份，轻易地取得了帝位。对此，《廿二史札记》曾有这样的评论：“古来得天下之易，未有如隋文帝者。以妇翁之亲，值周宣帝早殂，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。遂安坐而攘帝位。”（卷一五《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》）

隋文帝取代北周，不仅引起了宇文氏子孙和周室大臣们的愤恨，而且也引起了他自己女儿的不满。《资治通鉴》（卷一七五）说：

初，刘（昉）、郑（译）矫诏以隋主辅政，杨后虽不预谋，然以嗣子幼冲，恐权在他族，闻之，甚喜；后知其父有异图，意颇不平，形于言色。及禅位，愤惋逾甚！隋主内甚愧之……

为了树立权威，镇压不服，隋文帝在受位之后，对北周王室及文武大臣之不附己者，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恐怖手段。

其时，虽有尉迟迥、宇文胄……司马消难等起兵匡复，隋文犹假周之国力，不半载殄灭之。于是大权在手，宇文氏子孙，以次诛杀，殆无遗种！……（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五《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》）

取人之国，而灭绝其子孙。杨坚就是这样先以权谋，继以屠杀的两手，在北部中国建立了隋王朝。

二、平陈。隋文帝在初步稳定了北方之后，便积极准备以武力平陈以统一中国。隋文帝取周，可说是“唾手而得”；而要平陈，就不那么容易了，对此，隋文帝进行了充分准备。在正式出兵之前，先造舆论：

隋主……送玺书暴帝（按：指陈后主叔宝）二十恶；仍散写诏书三十万纸，遍谕江外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六）

根据《隋书·地理志上》的记载，当时，陈境内有“户六十万”。《通典》记载：“至开皇九年平陈，得户五十万。”（卷七《食货·历代盛衰户口》）《文献通考》说是：“陈……至后主亡时，隋家所收户五十万，口二百万。”（卷一〇《户口考一》）这就是说，当时江南的人口不过五六十万户。三十万份宣传品，按六十万户算，平均两户一份；按五十万户算，平均不到两户一份。可说是做到“家喻户晓”了。在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之后，接着就是出兵了。

（开皇八年，588）冬十月……甲子，将伐陈……命晋王广、秦王俊、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，以伐陈。于是晋王广出六合，秦王俊出襄阳，清河公杨素出信州……合总管九十，兵力五十一万八千，皆受晋王节度。东接沧海，西拒巴、蜀，旌旗舟楫，横亘数千里。……十一月，丁卯，车驾饯师。（《隋书·高祖纪下》）

据《通典》卷七《食货·历代盛衰户口》记载：“后周静帝末（580），授隋禅（581），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”；《文献通考》卷一〇《户口考一》则说是：“后周大象中（579~580），有户三百五十九万，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。”^①到开皇八年（588），才过了七八年时间，人口想来也不会增加得太多。在只有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国度里，竟出动了五十多万的大军，可以说是“倾国出动”了。

① 据《周书·武帝纪下》的记载，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六年（577）二月平齐时，得“户三百三十九万二千五百二十八，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”。户数还不及《文献通考》所载，口数却远远大于《文献通考》所载北周末年的人口数字。《周书》所载，颇为可疑。

已经奄奄待毙的陈王朝，在这样的军事力量面前，自然是不堪一击的。所以，隋朝出兵才一个多月，到了开皇九年（589）正月，便“陈国平，合州三十^①，郡一百，县四百”（《隋书·高祖纪下》）。而陈叔宝这个公子哥儿皇帝，也就俯首帖耳地做了隋王朝的俘虏。

平陈之后，隋文帝对待陈室君臣，和对待宇文氏完全不同。对此，《廿二史札记》（卷一五）里也有一段评论：

按：隋文灭陈，不惟陈后主得善终，凡陈氏子孙，自岳阳王叔慎以抗拒被杀外，其余无一被害者，皆配往陇右及河西诸州，各给田业以处之。同一灭国也，于宇文氏，则尽殄之；于陈氏，则悉保全之。盖隋之篡周，本不以道，与宇文氏有不两立之势，且恐有尉迟迥等之起兵匡复者，不得不尽绝其根芽。至取陈，则隋之基业已固，陈之子孙，又皆孱弱不足虑，故不复肆毒也。

这就是说，隋文帝取周，用的是权谋，是得之“不以其道”的。他为了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，镇压不愿归服的人，所以在取周之后，还要进行大屠杀。而灭陈，则用的是强大的武力，在大兵征伐中，已经慑服了陈室君臣，而且这时，隋王朝在北方的地位已大体巩固，所以，平陈之后，只需实行怀柔政策就行了。

平陈之后，统一了全国，结束了西晋末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。这是顺应历史潮流、符合人民愿望的。隋文帝对此，也感到非常得意。他曾自我夸耀地说：“朕……用轮王之兵，伸至人之意，百战百胜，为行十善！故以干戈之器，已类香华；玄黄之野，久同净国。”（《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》，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八）他对陈朝的大张挞伐，乃是“为”了修“行十善”；现在，他要“化干戈为玉帛”，建设他的“王道乐土”了。隋文帝的伪善面孔，在这里开始显露出来。其实，长期分裂局面的结束，全国的重新统一，归根到底，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。隋文帝杨坚，只不过是在这种大势所趋、人心所向的滚滚历史潮流中，恪尽了他的特定的历史职责而已。

在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后，隋文帝采取了诸如均田、薄赋等一些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有利于人民群众“休养生息”的

① 据中华书局《隋书·高祖纪下》校勘记二：“州三十”，应作“州四十”。

政策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。开皇以来，“二十年间，天下无事”（《隋书·高祖纪下·史评》），以至出现了“人物殷阜，朝野欢娱”（同上）、“户口滋盛，仓库盈积”（《隋书·食货志·序论》）的升平局面。虽然这种描绘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封建史学家粉饰太平的溢美之词，但是，开皇年间，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比较稳定，人口确有很大的增长，生产也有相当的发展，却也是史实。就拿人口的增长来说，据《隋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，到隋炀帝大业五年（609），已有“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^①，口四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六”。较之隋王朝初统一时的一千多万人口来，二十年来的时间里，竟然增长了三倍多！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增长了。再拿农业生产的发展来说，开皇九年（589），“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”（《通典》卷二《食货·田制下》）；而到了大业五年（609），已有“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”；而且，“其邑居道路，山河沟洫，沙碛咸卤，丘陵阡陌，皆不预焉”（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）。垦田数量激增，自然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。《隋书·食货志》里还有这样的记载：

（开皇）十二年（592，十二月），有司上言：“府藏皆满”，（文）帝曰：“朕既薄赋于人，又大经赐用，何得尔也？”对曰：“用处常出，纳处常入。略计每年赐用，至数百万段，曾无减损。”于是乃更辟左藏之院，构屋以受之。

《资治通鉴》（卷一九二）里，也有如下的记载：

〔贞观二年（628）春正月〕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开皇十四年大旱，隋文帝不许赈给，而令百姓就食山东，比至末年，天下储积，可供五十年！”

这些情况说明，开皇年间，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的发展。当然，封建统治阶级终究是要压迫、剥削劳动人民的。不管是“均田”也好，“薄赋”也好，都只能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待，否则就会看不清楚历史真相。就拿“均田”来说，表面上看，农民似乎也一样能够每人领受若干

① 中华书局《隋书·地理志》校勘记四说：“……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。按：据本志各郡分列的……户数统计：……户九百零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一”。

亩田地，而且其中一部分（即桑田或麻田）还是可以自行买卖的“永业田”。实际上，真正“受惠”的还是大官僚、大地主们。这些特权阶层利用特权，强占、侵吞大量土地，而普通农民往往只能领受很少一份土地。《隋书·食货志》说：“其狭乡（按：指人多、地少的地区），每丁才至二十亩，老小又少焉。”这和政府“遵后齐之制”规定的“一夫受露田八十亩，妇四十亩”，“又，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，为桑田；……土不宜桑者，给麻田，如桑田法”（《隋书·食货志》）合计一百四十亩^①的限额，相差甚大！其实，岂止“狭乡”是这样，就是在地旷人稀的所谓“宽乡”里，农民真正能够得到法定限额土地的，也是不多的。“均田”如此，“薄赋”呢？所谓的“府藏皆满”，以及“天下储积，可供五十年”之用的记载，正好表明隋朝赋税的繁重。对此，《隋书·食货志》也有详细记载：

丁男一床（夫妇），租粟三石；桑土调以绢绝，麻土以布绢。绝一匹（四丈），加绵三两；布以端（六丈），加麻三斤。单丁及仆隶，各半之。

十八以上为丁，丁从课役；六十为老，乃免。

有品爵及孝子、顺孙、义夫、节妇，并免课役。

这哪里是什么“薄赋”，完全是一种沉重的租税负担。而且，农民缴租纳粮，还得自己去长途运送：

……诸州调物，每岁河南自潼关，河北自蒲坂（今山西永济县境），达于京师，相属于路，昼夜不绝者数月！（同上）

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，就这样大部分都被搜刮进了封建王朝的仓库里。遇到饥荒，尽管“仓粟红腐”，而灾民们却吃不到本来是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，这是何等的不合理！就这样，隋文帝竟还标榜什么“躬履俭约”，“薄赋于民”，又是何等的伪善！到了炀帝杨广的时候，情况就更加严重了。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，荒淫无度，终于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。

隋王朝是一个统一的王朝，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，总共只有两代

^① 北齐还规定：“丁牛一头，受田六十亩，限止四牛。”（《隋书·食货志》）则有耕牛的农夫，按照政府规定，受田数额至少在二百亩。

三十八年（581~618）。

隋文帝父子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，采取了各种办法，其中包括扶植、利用佛教的办法。下面，简略叙述隋文帝父子积极利用佛教的大致情况。

第二节 隋文帝与佛教

一 生养在尼姑庙的隋文帝

据史书记载，隋文帝杨坚是在尼姑庙里出生的，并且是由一个尼姑抚养大的。关于这件事，《隋书》是这样说的：

皇妣吕氏，以（西魏文帝元宝炬）大统七年（541）六月癸丑夜，生高祖于冯翊（今陕西大荔县）般若寺……有尼来自河东，谓皇妣曰：“此儿所从来甚异，不可于俗间处之。”尼将高祖舍于别馆，躬自抚养。（《高祖纪上》）

道宣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（卷乙）也记载了这件事：

案：隋著作（郎）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：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^①般若寺。……帝母以时炎热，就而扇之，寒甚，几绝，困不能啼。有神尼者，名曰智仙，河东刘氏女也。……及帝诞日，语太祖曰：“儿天佛所祐，勿忧也。”尼遂名帝为“那罗延”^②，言如金刚不可坏也。又曰：“儿来处异伦，俗家秽杂，自为养之。”太祖乃割庄为寺，以儿委尼，不敢召问。……帝年至十三，方始还家。及周灭二教，尼隐皇家。……及登位后，命史官为尼作传。

道宣《续高僧传》（以下简称《续僧传》）也讲到了这件事：

太祖乃割庄为寺，内通小门，以儿委尼，不敢名问（这里作“名问”，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作“召问”）。后皇妣来抱，忽……惊

① 隋为冯翊，唐称同州，即今陕西大荔县。

② 那罗延，梵语，多义词：1. 天上力士的名字，有“端正猛健”的意思。2. “大梵天王”的异名：“那罗”，“人”的意思；“延”，“生本”的意思。印度婆罗门教认为：世界、人类，都是从“大梵天”生的，“大梵”是人类、众生的本原。3. “坚固不坏”的意思。

遑堕地。尼曰：“何因妄触我儿！遂令晚得天下。”及七岁，告帝曰：“儿大当贵，从东国来；佛法当灭，由儿兴之。”而尼沉静寡言，时道成败、吉凶，莫不符验。初在寺养帝，年十三方始还家。……及周灭二教，尼隐皇家，内着法衣。……帝登祚后，每顾群臣，追念阿闍梨。……乃命史官王邵为尼作传。（卷二六《道密传》）

在所有这些记载里（除道宣著作里的一些明显的宗教附会外），可以看出几点：

1. 隋文帝杨坚，是生、养在尼姑庙里的，并且一直到了十三岁，方才离开尼寺，回到家里。

2. 尼姑智仙，同杨家的关系，非比寻常。文帝出生之后，生母简直不能过问（甚至偶尔来抱，智仙竟也斥责：“何因妄触我儿！”），而由智仙这个尼姑一直抚养到十三岁。在周武灭佛之后，这个尼姑就“隐居皇家”了。

3. 也是重要的一点：“儿天佛所祐”，“儿来处异伦”。这就是说，隋文帝杨坚这个人，是“天佛所祐”的、非同一般的“异人”、“神人”；他是特地奉“天佛”之命、托“天佛”之福，降生到人间来，当“救世主”，做皇帝的。

隋文帝一直在尼姑庙里生活了十三年，受宗教的影响，自然是很深的。所以，在他的身上，不仅有着一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印记，而且还有着由于宗教的熏陶而形成的、较之他人更加狡诈与伪善的特性。他在做了皇帝之后，标榜自己“夙夜祗惧”，“小心励己，日慎一日。以黎元在念，忧兆庶未康，以庶政为怀，虑一物失所……”（《隋书·高祖纪下》）等，简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皇帝！其实远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关于隋文帝的为人，《隋书》曾有这样的评论：

二十年间，天下无事，区宇之内晏如也。考之前王，足以参踪盛烈。但素无术学，不能尽下，无宽仁之度，有刻薄之资，暨乎暮年，此风逾扇。又，雅好符瑞，暗于大道……听哲妇之言，惑邪臣之说，溺宠、废嫡，托付失所。灭父子之道，开昆弟之隙，纵其寻斧，翦伐木枝。坟土未干，子孙继踵屠戮；松楸才列，天下已非隋有。惜哉！（《高祖纪下·史评》）

对于隋文帝的为人和他一生的功过，这个评论，大体说来是符合史实的。当然，“区宇之内晏如也”之类的话，显然是粉饰太平之词。《隋书》还说他：

……然天性沉猜，素无学术，好为小数，不达大体，故忠臣义士，莫得尽心竭辞。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，诛夷、罪退，罕有存者。又不悦诗书，废除学校，唯妇言是用，废黜诸子。逮于暮年，持法尤峻，喜怒不常，过于杀戮。……又往往潜令人賂遗令史府史，有受者必死，无所宽贷。（《高祖纪下》）

为了考验官吏们是否廉洁，暗中派人去故意行贿，对方要是接受了，就杀了他，而且“无所宽贷”。堂堂的一个皇帝，却搞这么一些小动作，活现出一副“好为小数，不达大体”的模样。司马光在评论隋文帝时，也谈到了这一点：

上性猜忌，不悦学，即任智以获大位，因以文法自矜。明察临下，恒令左右觐视内外，有过失，则加以重罪。又患令史赃污，私使人以钱、帛遗之，得犯，立斩！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七）

诱人受贿，然后杀之，这样的皇帝也太不光明正大了。王夫之对于隋文帝，也有相当尖锐的评论：

……乃惟帝任诈以取天下，昵悍妻，狎逆子，任其好恶于非僻……

考其时，北筑长城，东巡泰岳，作仁寿宫，而丁夫死者万计；别宫十二，相因营造，则其搜剔丁壮以供土木也，不待炀帝之骄淫，而民已无余地以求生矣！

隋文帝，锱铢之主也！

文帝……以涂饰虚伪笼天下……

……始以欺人，终于自罔，身弑、国亡，若蹈火之必灼，狎水之必溺也，岂有爽哉！（《读通鉴论》卷一九《隋文帝》）

百般美化自己的隋文帝，原来却是一个“任诈以取天下”、“以涂饰虚伪笼天下”的“锱铢之主”。这一评论，可说是入骨三分。王夫之对于隋文帝自我标榜的“务存俭约”，也进行了严厉批评：

隋文帝之俭，非俭也，吝也！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。富有四海，求盈不厌，侈其多藏，重毒天下，为恶之大而已矣。（同上）

还说：

隋之毒民亟矣！而其殃民以取灭亡者，仅以两都、六军、官、匠胥之仰给，为数十年之计，置雒口、兴雒、回雒、黎阳、永丰诸仓，敛天下之口食，贮之无用之地；……其究也，所敛而积者，只为李密聚众、唐公得民之资，不亦愚乎？！隋之富，汉、唐之盛，未之逮也。逆广……给其穷奢，尚有赢余，以供李密、唐公之枵腹，皆文帝周于攘聚之所积也。……

……粟朽于仓，人殍于道，豪民逞，贫民毙，争夺兴，盗贼起，有国破国，有家亡家……悲夫！（同上书《隋炀帝》）

为了王朝统治集团的需要，遍设官仓，“敛天下之口食，贮之无用之地”，到头来，只是为李密、李渊等起兵提供了粮秣军需。官逼民反（在这里，王夫之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，把农民起义，诬之为“盗贼起”），终于招致了“殃民以取亡”的结局。隋文帝是如此的贪得无厌，却还要标榜什么“务存俭约”，不是太虚伪了吗？他的贪婪、伪善，还可以从开皇十四年（594）关中大旱，“隋文帝不许赈给，而令百姓就食山东”的事件中看出来。关于这件事，《隋书》说：“（开皇）十四年……八月……关中大旱，人饥。上率户口就食洛阳。”（《高祖纪下》）关中的百姓遭受了旱灾，闹了饥荒，皇帝竟亲自“率户口就食洛阳”。乍看起来，隋文帝倒是一个能够和百姓“同甘苦”、“共患难”的好皇帝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史书说得明白：为什么“不许赈给”呢？是关中没有公粮吗？不是的。上文已指出，当时隋王朝的“天下储积，可供五十年”之用，说明当时官仓的储粮是很多的；而且，据《资治通鉴》（卷一九五）的记载，贞观十一年（637）八月间，侍御史马周在他的上疏中还讲到隋朝的“两京府库，亦为（唐朝）国家之用，至今未尽”。从开皇十四年到贞观十一年（594-637），已经过了四十多年，而隋王朝留下来的“两京府库”的粮食，还“至今未尽”。拥有这么多的公粮，而“不许赈给”，却要让灾民们到外地去“就食”，“就食”于谁呢？当然不是“就食”于官（如果这样，就用不着去外地了），而只能是“就食”于民了。

也就是说，要让非灾区的老百姓，替政府救济灾民。面对“人殍于道”的凄惨景象，虽“粟朽于仓”，杨坚却不许赈给，竟然不惜屈“万乘之尊”，亲自率领灾民们到外地去行乞（名曰“就食”，实是行乞），其“涂饰虚伪笼天下”的面孔，不是太可憎了吗？

就是这样的一个隋文帝，还要给自己披上一件佛教的外衣。

二 隋文帝对佛教的扶持和利用

隋文帝曾同一个叫灵藏的和尚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律师度人为善，弟子禁人为恶，言虽有异，意则不殊。”（《续僧传》卷二一《灵藏传》）清楚地说明了隋文帝为什么非披佛教外衣不可。原来，他当皇帝的，用暴力去“禁人为恶”，防止人民起来造反；同时，还需要和尚们去帮他“度人为善”，就是用佛教去欺骗、愚弄人民。隋文帝用自己的“金口玉言”，讲出了他大力扶持、积极利用佛教的最本质的原因。这同（刘）宋文帝要利用佛教以“坐致太平”，如出一辙。隋文帝扶植、利用佛教，概括起来，有以下五个方面。

（一）广建寺塔

据史书记载，仁寿年间，隋文帝先后三次下诏，在全国一百一十三州，总共修建了一百一十三座舍利塔。

第一次，仁寿元年（601），六月十三日（文帝生日），在三十州修建三十座舍利塔。在这次的建塔诏书里，是这样说的：

……朕归依三宝，重兴圣教，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，俱发菩提，共修福业……永作善因，同登妙果。宜请沙门三十人，谙解法相，兼堪宣导者，各将侍者二人，并散官各一人，熏陆香一百二十斤，马五匹，分道送舍利，往前件诸州起塔。……莫问同州、异州，任人布施，钱限止十文已下，不得过十文。所施之钱，以供营塔。若少不充，役正丁，及用库物。率土诸州僧尼，普为舍利设斋。限十月十五日午时，同下入石函。总管、刺史已下，县尉已上，息军机、停常务七日，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。务尽诚敬，副朕意焉。（《广弘明集》卷一七《国立舍利塔诏》）

这道诏书，是由内史令、豫章王（杨）暕于仁寿元年（601）六月十三